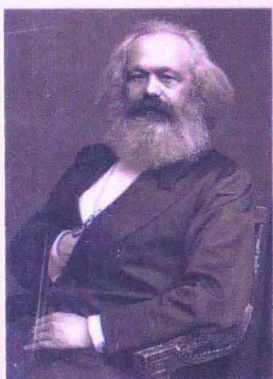




今日马克思主义
研究系列



吴苑华◎著

The Research
of The World
System Marxism

世界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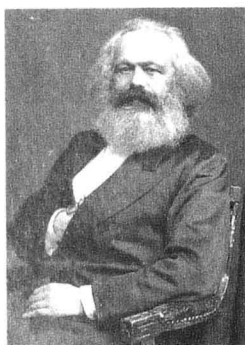
——以乔万尼·阿瑞吉的理论为例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今日马克思主义
研究系列



吴苑华◎著

The Research
of The World
System Marxism

世界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

——以乔万尼·阿瑞吉的理论为例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例 / 吴苑华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

(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08440-4

I. ①世… II. ①吴… III. ①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44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 插页

字数:280 千字

定价:48.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概述	5
第一节 理论生成	5
第二节 理论渊源	16
第三节 理论主题	56
第四节 理论特征	68
第五节 理论价值	80
第二章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	89
第一节 现代世界体系	89
第二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	94
第三节 全球化与世界的大分流	111
第四节 理论品质	127
第三章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反体系运动	135
第一节 反体系运动的内涵	135
第二节 反体系运动的困境	138
第三节 反体系运动的出路	142
第四节 理论品质	146
第四章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道路	151
第一节 传统中国道路	151
第二节 当代中国道路	162
第三节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183
第四节 理论品质	199
第五章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马克思	207
第一节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	207

第二节 马克思活在现时代·····	232
第三节 马克思理论的缺陷·····	241
第四节 理论品质·····	255
参考文献 ·····	270
后 记 ·····	283

前言

乔万尼·阿瑞吉^① (Giovanni Arrighi, 1937—2009) 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②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 早年在意大利完成中学和大学的学业, 后又去法国求学; 为了谋生, 于1963年从欧洲移居非洲, 申请获得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 1966年, 由于参加非洲反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遭到殖民统治政府驱逐, 被迫迁往达累斯萨拉姆; 1969年返回意大利, 在特兰托大学谋取一份教职; 1979年移居美国, 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工作, 参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思·霍普金斯创办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世界体系论研究; 从1989年起, 阿瑞吉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直至2009年6月逝世。阿瑞吉一生中做过工厂管理者、职员、经理和大学教员, 足迹遍及欧洲、非洲和北美。他倾向于激进主义, 对欧洲殖民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和不满, 对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支持。阿瑞吉一生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世界体系论的建构上。虽然这个理论不属于他一个人, 但是他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 为创立这一理论做出了奠基性工作, 进行了独特的学术研究, 丰富和深化了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的世界体系理论, 扩张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学术空间和研究深度。因此,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从总体上讲,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包括以下内容: 将整体主义思维作为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理念, 将结构主义思维作为世界体系分析之基础, 将

^① 在我国学术界, “Giovanni Arrighi”的译名尚未统一, 出现了乔万尼·阿里吉、杰奥瓦尼·阿锐基、杰奥瓦尼·阿瑞基、乔万尼·阿瑞吉等。为避免这种使用混乱, 笔者在自己的文本中统一使用“乔万尼·阿瑞吉”或简称“阿瑞吉”。

^② 我们关于阿瑞吉生平的言说是根据有关资料的信息所作的简单整编, 请参阅《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大卫·哈维所写的访谈录《资本的曲折道路》。

周期性变化视为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将资本积累视为考察世界体系的核心指标,将帝国主义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保障性力量,将中心—边缘关系视为世界体系的结构基础,以及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视域中反思了反体系运动、中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等专题性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不同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沃勒斯坦的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本书就是着眼于探讨阿瑞吉的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国道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与实质,及其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则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内容具有以下理论研究意义:

第一,有助于全景式地了解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著名的世界体系论是由沃勒斯坦、霍普金斯和阿瑞吉三人创立的,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关注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是不完整、不健全,也是不健康的。阿瑞吉的理论是世界体系理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在完成一项整体项目的意义上研究阿瑞吉的。加之,阿瑞吉与沃勒斯坦、霍普金斯的世界体系理论有着较大差别,这在客观上也说明了没有对阿瑞吉的充分研究,就不能说是一个完备的理论思路。因此,探索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体系理论的合理选择和必由之路。

第二,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本质内涵及当代价值。阿瑞吉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考察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揭示了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这种研究是把经济学研究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阐释了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差异,尤其揭示了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所作的批判性理解及其当代价值,强调了马克思和斯密的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判断在当代东西方社会发展中得到了不同意义的验证。正如他所说: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不仅如此,阿瑞吉还在书中多处批评马克思在许多重要方面误解了斯密,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人们对斯密的误解。这样一来,我们从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诸多颠覆性解读中也能感觉到,即便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马克思理论也是一个不断被人们探讨的课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留给后世的遗产不只是那些文本,还包括诸种理论和研究主题,后两项内容使得马克思在他身后的每个时代都被人们广泛关注和争论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

的理论和主题涉及当代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探索。比如,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界贸易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分工与世界的平等发展、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霸权及转移与资本主义兴衰、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东亚复兴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中国崛起及世界意义、反恐战争,以及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等,都需要人们在马克思的视界中作出某种回答。就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说过的那样,马克思已经为理解上述理论与实践问题预设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视野,即他们常说的“大历史视野”。所谓“大历史视野”,从分析方法上讲,就是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恰恰蕴含了这种“大历史视野”,亦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所以阿瑞吉对马克思的学说的重新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第三,有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本质内涵及其价值,从而验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欧美和东亚(尤其中国)的市场经济。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后者是国家市场经济,奠基于国家市场社会,前者则奠基于自由贸易之基础上。当然,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有别于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因为后者是在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汲取了不少欧美市场经济的成分,但它们二者有着本质差异。就是说,欧美的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国家市场经济。从阿瑞吉的理解看,市场经济可分为三类: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阿瑞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持有异议,认为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但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且不好定论,尽管如此,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属于国家市场经济则是明确和肯定的。这正是中国崛起能够在当今世界经济极其艰难时期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这就启示人们,关于“市场经济”不能单纯套用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来理解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要学会区别对待和具体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市场经济,否则就会犯错误。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它们二者不可能搞同一种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阿

瑞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反自然的、剥夺性积累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然的、无剥夺性积累的市场经济,因而未来的世界历史必然放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见,本书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阿瑞吉的市场经济理论,尤其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四,有助于增进“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包括沃勒斯坦和阿瑞吉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萨米尔·阿明和冈德·弗兰克创立的依附理论,这些理论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结合起来,遵循一体化学科研究路径,广泛地考察了历史资本主义以及世界历史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不仅重新阐释了世界历史的规律性,而且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危机理论、历史动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意识形态理论、国家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社会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理论,尤其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见解等,驱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理论构筑的“神秘雾障”,还原它的本真面目,揭示其合理内容和不足之处,说明马克思理论不该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应当是一个可以商讨的学说。由此来看,本书内容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此,本书将用后面的五个章节对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展开具体讨论。

需要提示的一点是,阿瑞吉的观点大部分是进步的、有益的,但是有的观点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甚至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读者会作出理性的判断。

第一章

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概述

乔万尼·阿瑞吉,是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世界体系理论是阿瑞吉学说的核心部分和基础内容,也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值得人们努力探索研究。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从整体上综观地了解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过程、理论来源、思考主题、研究方法、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等基本内容,形成一个全景式的理论画卷,而后专题性地考察他的核心议题,通过点面结合和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之研究,展示一个内容完整、内涵丰富的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

第一节 理论生成

从阿瑞吉一生来看,他的学术活动^①可分为四个时期,在其中展示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情况。

一、第一时期(1937—1963):早年意大利时期

阿瑞吉接受了早期教育,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学研究基础。阿瑞吉于1937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一生中,从事过车间工、实习经理、工厂经理、跨国公司经理和教师等职业。其外祖父和父亲

^① 本节参考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大卫·哈维所写的访谈录《资本的曲折道路》。

都是纺织机、供暖和空调设备生产厂商。他在1955年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后接手自家的工厂事务,但为了工厂经营又进入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系学习,196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博克尼大学的新古典主义。后来,由于自家工厂经营不善而破产,他一度在外祖父工厂的车间工作,再后来,因与外祖父发生了一次争执而出走,不久加入了联合利华,并接管联合利华实习经理的工作。可以看出,阿瑞吉这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就是在博克尼大学的新古典主义影响下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值得称赞的是,他在研究中发现,“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于理解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收入分配”反倒“毫无助益”。^①这意味着阿瑞吉从一开始就注意实践探索,不盲从权威理论,表现出独立思考和敢于超越的良好学术潜质。

二、第二时期(1963—1969):非洲阶段

在这一时期,阿瑞吉处于谋生状态,工作之余积极探索进步思想,并且与非洲激进主义思想建立了联系,使得阿瑞吉的学术思想开始“左转”。需要注意,阿瑞吉在非洲分为前期罗得西亚阶段和后期达累斯萨拉姆阶段。

(一)前期:罗得西亚阶段

阿瑞吉于1963年奔赴非洲的津巴布韦,接受伦敦大学分校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它的意义表现在:

其一,他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认识了克莱德·米切尔和雅普·范维森等社会人类学家,并从前者那里习得了“从事网络分析法的研究”模式,从后者那里习得了“情境分析法”(又称“扩展安全研究分析法”),它们都促使阿瑞吉“逐渐放弃了抽象的模型设计,转向具体的、经验主义的,并以历史为依据的社会人类学理论”。重要的是阿瑞吉以此为契机“踏上了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征”^②。可以说,这一转变是阿瑞吉的学术研究生涯的“分水岭”。这种进步为他日后转向并确立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奠定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基础。

其二,阿瑞吉能够亲身实地考察和了解非洲殖民主义状况、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问题的现状,并且将这方面的亲身观察写成论文公布

^{①②}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2页。

于世,比如《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1966)和《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1973)^①等。这些成果描述了“罗得西亚农民全面无产阶级化给资本积累造成矛盾的途径”,展示了这种“无产阶级化”是非洲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揭示了非洲无产阶级化“最终为资本主义部门带来了更多问题而非有利条件”。^②他还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不过,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向瓦解。只有在支付全部生活工资时,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劳工才会受到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其实使对劳工的剥削更困难而非更容易,而且往往要求政权变得更加压制。”^③可是,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并非局部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的现象,从整个非洲南部地区到东北角都出现大量农民“遭到极度剥夺进而无产阶级化的范例”^④。这类思考为他日后思考资本积累、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以及东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异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基础。

(二)后期:达累斯萨拉姆阶段

其一,阿瑞吉在参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了解到非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促使他的思想“左转”。以他之言,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宣传口号,但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性。他曾说过:“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我1966年来到达累斯萨拉姆时,坦桑尼亚才独立几年。尼雷尔正在宣扬他设想的一种非洲社会主义模式。”^⑤

其二,结识了一批新左派学者,促使他走向非洲激进主义思潮。他说过:“达累斯萨拉姆成为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所有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流亡者的前哨基地。我在当地大学工作了三年,结交三教九流,如来自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活跃分子,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大卫·埃普特、沃尔特·罗德尼、罗杰·默里、索尔·皮茨奥托、凯瑟琳·霍斯金斯、吉姆·梅隆(后成为‘气象员派’创始人之一)、路易莎·帕瑟里尼(当时正在研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等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约翰·索尔。”^⑥

① 这篇论文于1973年发表在《非洲政治经济论文集》中,不过它的主题研究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当时就已经获得比较成形的认识,重要的内容也伴随《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一文公开于世。

②③④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3页。

⑤ 同上,第4页。

⑥ 同上,第5页。

其三,因以上两个方面因素激发,阿瑞吉将自己的研究从劳动供给问题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问题上。正如他所说:“在达累斯萨拉姆与索尔共事期间,我的研究兴趣从劳动供给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政权问题……对我而言,这些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绝非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当它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它们是平民主义政权,因此除了民族解放外,我并不指望更多,而我们都认为民族解放从本质上说是非常重要的。”^①所有上述经历和思考都为他积极且系统地研究反体系运动和中国道路问题,以及创立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精神力量、思想自觉和学术基础。

三、第三时期(1969—1979):意大利阶段

一方面,阿瑞吉积极地整理前期的非洲经验,使之成为系统化的理论,让意大利人了解非洲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他积极地参与意大利工人运动,配合工人运动领袖宣传左派的激进思想。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这个时期正是他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换言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学术阶段。

其一,阿瑞吉1969年回到意大利以后,首先在特兰托大学担任讲师,开设非洲问题专题讲座。这门课受到“不断斗争”组织中的博托派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特兰托大学的重要课程之一。这所大学是意大利学生运动的主要中心,学生思想比较激进,因而许多人都对非洲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阿瑞吉的讲座也遭到了同在“不断斗争”组织中的拉斯塔诺派学生的抵制。尽管如此,阿瑞吉利用了这种讲座第一次明确而且系统地向同胞们表达和传播了他的新左派思想。

其二,阿瑞吉此时得到了路易斯·帕瑟里尼引荐,获得机会深入都灵的工人运动,实地考察意大利工人运动状况,这使得他深切体会到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以及工人运动的进步性。重要的是,阿瑞吉在接触工人和参与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了葛兰西的思想。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与罗马诺·马德雷一起,我们开始产生寻找与该运动有关的葛兰西战略的想法”^②。这多

①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5页。

② 同上,《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6页。

少直接根源于马德雷当时是一名“葛兰西主义者”。在当时工人运动对葛兰西思想的需要的驱动下,阿瑞吉与马德雷、帕瑟里尼一起在1970年共同创办了“葛兰西研究小组”,着重探索工人运动中的组织与领导权问题,强调葛兰西战略思想及其实质,指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当葛兰西研究小组在推动工人运动和组织建设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后,于1973年秋季正式解散。尽管如此,意大利工人运动则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阿瑞吉通过对上述两方面活动的深入思考,有效地提炼和深化了前期的非洲经验,尤其对资本主义危机有了新认识,这方面的思考成果就是197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刍议》一文。正如他自己所说:“1972年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都源自这种交流。工人们被告知,‘眼下正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如果我们坚持斗争,工厂的就业机会就会丧失’。工人们因此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处于危机中吗?果真如此的话,其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因此只能保持平静?’《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刍议》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棘手的、工人自己构建的环境下写成的。”^①这篇文章既是对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前期的非洲经验的一种总结。

其三,当阿瑞吉在1973年转到卡拉布里亚大学工作之后,他的学术研究又从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转向劳动供给问题研究。以他之见,卡拉布里亚大学能够提供研究“劳动供给”问题的方便,因为卡拉布里亚大学所在地是移民中心,而移民的中心问题是劳动供给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移民问题就会转化为阶级斗争和巨大的社会冲突,所以研究劳动供给既是一种学术兴趣使然,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他曾经提出:

我在罗得西亚时已看清,当非洲人全面无产阶级化,或更确切地说,当他们意识到正在全面无产阶级化时,这是如何引发城市地区争取生活报酬的斗争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单身男性,我们的家人继续在乡下过着农村生活”之说只是个想象,一旦他们不得不真正在城市中生活,这无法持久。我在《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中已指出这一点。在意大利,这变得更加明朗,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谜团:从1950年到1960年代初,南方移民作为不愿参加工会的工人被带到北方工业区。但从1960

^①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7页。

年代起,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他们却被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而这又是移民的典型经历。当我在卡拉布里亚建立研究小组时,我要求他们研读有关非洲的社会人类学作品,特别是有关移民的作品。然后,我们从卡拉布里亚对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问题在于:是什么在为这种移民创造条件?在某一点上,移民自身成了好战的先锋队,而未成为可用来破坏北方工人阶级谈判能力的驯服的劳动力,其局限性是什么?①

他还强调道,在对解答上述问题的探索中,获得了两点思想启示:一是“资本主义发展并非必定依赖于全面无产阶级化”②;二是“移民在其迁居的地方从事工人阶级斗争的倾向,也取决于是否拥有据认为永远决定其生活机会的条件”③。

其四,阿瑞吉在去美国之前的1978年完成了《帝国主义几何学》一文。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在于突出了霸权概念及其研究价值。他说过:

作为有关帝国主义的一次演练,对我来说它也确实发挥了霸权概念转化的作用。我在1983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几何学》第二版后记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分析当代国家间体系动态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比帝国主义更有用。从此观点出发,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只是重新应用葛兰西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霸权概念。在葛兰西之前,这一概念最初曾应用于国家政治管辖权内的阶级关系分析。当然,葛兰西为此用很多以前无法理解的方式丰富了这一概念。这使我们在将其再度应用于国际问题时受益匪浅。④

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及其学术进步都为他日后从事世界体系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第四时期(1979—2009):美国阶段

这是阿瑞吉学术生涯的发展和繁荣阶段。这一阶段时间长,占据了他的

①②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8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同上,第10页。

整个后半生,关键在于这还是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分为“宾厄姆顿时期”和“霍普金斯时期”。

(一)宾厄姆顿时期(1979—1989)

阿瑞吉在1979年去了美国,首先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1989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为期十年。这是他在美国的前期,亦是他创立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最重要的时期。阿瑞吉在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积极地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参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建工作,最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意义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它们的内容既是对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状况和实质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阿瑞吉自己先前这方面的整个思考所作的完整表达,体现了阿瑞吉在世界体系分析视野中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危机、霸权及转移,以及社会运动的特征、根源、实质等重要问题所作的原创性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许多成果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世,比如《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1990)、《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1991)、《漫长的20世纪》(1994)等。前两者是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成果,是他在世界体系分析视野中思考了20世纪世界劳工运动的演变特征以及对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影响,揭示了劳工与世界资本主义互为因果关系的事实。

阿瑞吉说:《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一文“涉及我经常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疏忽”。这个“疏忽”就是:《共产党宣言》“有一个不论在知识上还是历史上确实都不够严谨的逻辑跳跃”,就是指:

对于资本,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别、种族、民族等都无足轻重。对于资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剥削的可能性。因此,工人阶级中处于最可剥削地位的群体就是资本要剥削的那个群体,而不必考虑种族、性别和民族带来的歧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能指出,工人阶级中不同地位的群体就会简单接受。实际上,恰恰在无产阶级化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工人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将利用可以识别的地位差距组织起来,以争取资本家的特殊待遇。他们将根据性别、民族或种族等动员

起来,争取资本的特殊待遇。因此,“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并不像其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因为它表明了工人阶级内部地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保护工人阶级不受资本的支配。资本的支配使劳工被视为无差别的群体,只要在资本获益的情况下就将被雇用。因此,这篇文章最后作出了乐观的结论,即出现了拉平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人们应期望工人起来战斗,通过地位集团架构或与此趋势相逆的联合来保护自己。^①

《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揭示了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区域性财富分析等级体系的稳定特征及原因。他说:

历来从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断言,全球收入分配的稳定意味着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不流动性。这种相对稳定的不平等构架还将继续存在,只是国家间的此消彼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尤其是从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突出表现在,充满生机的东亚的崛起以及停滞不前的非洲的低迷,尤其是南非——冠以“劳动力储备的非洲”。这一分歧点令我好奇:为什么南非和东亚朝着如此相反的方向发展?要了解这一现象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把握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农民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例如非洲,还是像东亚那样建立在局部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两个地区的分歧必然衍生出一个理论问题,这再一次向布伦纳界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劳动力的完全无产阶级化”发起挑战。^②

据阿瑞吉自己所说,《漫长的 20 世纪》一书本来也是准备探讨历史资本主义的劳工问题,只不过,在深入的研究中发现金融周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阿瑞吉及时调整了写作计划,转向系统地研究金融周期及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③正如他所说:“有关金融化

① [意]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第 16 页。

② 同上,第 18 页。

③ 据阿瑞吉自己所说,有关劳工的研究由他的夫人贝弗里·西尔弗来承担,后者写成《劳工的力量》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u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2003.)。